



此外,既然拍的是壁画,也正因为它的限制词是“壁”,拍出来的不能像一张纸画,要把壁画的肌理感表达到位。还要考虑从美术角度,来展现古人在色彩、构图、线条上的美妙之处。

自我突破,记录下保护的“演变”过程

来到莫高窟的游客们总是好奇,为什么有不少洞窟总是“大门紧锁”?里面究竟藏了什么宝贝?对此,孙志军解释说,其实,有些就是空的洞窟,而另一些则很有可能是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修复、临摹、数字化等工作。

据孙志军介绍,为了使莫高窟可以“永久长存”,敦煌研究院自2000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数字敦煌”项目——将无比珍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用数字化的技术进行复制、归档、保护。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了160多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工作。另外,伴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敦煌研究院还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目前,孙志军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的主任。他的工作任务也因此逐步转变。孙志军说,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保护、研究和实践,现在敦煌莫高



窟的保护、研究、修复和管理工作已经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提升到预防性保护的新阶段。然而,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敦煌石窟的保存、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只要莫高窟存在,它的保护就永无止境。”

除了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在此期间,孙志军也记录下了文物保护人员不断在和时间的流逝、岁月的痕迹进行的斗争,开展的各种保护和研究工作。“我对于保护工作的记录也是想让大家来了解这些不为人知的场景。或许,这些工作人员都默默无闻,但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撑起了敦煌研究院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艰巨使命。”在孙志军看来,这类拍摄其实也是相对有难度的,因为它可不仅仅是人物摄影那么简单,“首先,要考虑到这是在莫高窟洞窟里面拍摄,一方面拍摄工作绝不能对洞窟文物造成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又受到莫高窟内部环境的制约。在有限的空间内,还要考虑到人物所从事的工作和洞窟之间的隐喻关系,而不是仅仅当作人物肖像来拍摄”。

同样在2000年,孙志军还迎来了摄影生涯的重大转变。他参与了国家文物局课题“敦煌莫高窟及周边环境演变”,全面记录敦煌3.12万平方公里内的地貌、水资源、人文遗迹及其环境。

接到课题的初期,孙志军非常兴奋,干劲十足。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地去捕捉迷人的光影效果,然而拍了半年左右,他就碰到了瓶颈。孙志军在整理照片时发现,即便单张照片看起来都很漂亮,但放在一起比较就发现了问题,“过多重视视觉语言强度而缺乏信息内涵及系统化”。这导致了照片在呈现上非常雷同,没能展现大自然的“喜怒哀乐”,而且课题是叫“环境演变”,显然,这一特点没能展现出来。

“这些漂亮而苍白的照片只是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镜像表面,没有向人们传递出足够的物像历史信息,因此也就丧失了历史地理摄影的真正意义——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他苦苦寻觅最佳呈现方式,却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拍了半年也就停滞了。偶然一次,孙志军在藏经洞的拍摄过程中,突然开了窍,他拍着拍着突然想到了藏经洞出土的几万卷历史文献,“里面会不会记载了敦煌山川地理方面的内容”?这个想法让孙志军再度兴奋了起来,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从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目录中查找资料。但是,在古文献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搜寻资料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犹如大海捞针。他在资料室愣是泡了一个多礼拜,“借助李正宇、李并成先生等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从6万多卷敦煌藏经洞文献里找到了42卷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类文献。”这让孙志军茅塞顿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加上在敦煌多年的摄影工作经历,古代敦煌及周边地区的河流、山脉、渠道、湖泊、驿站、城池等古迹都仿佛立体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也帮助他在往后的拍摄过程中,能将文献中记载的山川古迹等历史地理信息,经方位、里距、四至等方面的比对分析与现状——比定,采取图文对应的摄影报告方式,清晰地反映出古今敦煌的城池、边塞、水系、植被等方面的演变。

虽说课题早已完成,但孙志军至今都没有停止对这个主题的拍摄:“首先,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也认识到了环境对文化遗产地的制约因素,那么我就应该要持续去关注它。正如很多人所说,幸亏莫高窟在甘肃才能保存下来,要在江南的雨水洗礼下早就没了。所以,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文物,既然我找到了相对正确的方法,我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去关注它。”

“最好的取景地就是在以你家为圆心,五分钟的路程之内。”孙志军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个范围内的细枝末节你都了解。比如,在某种光线下,你知道适合去拍某栋房子的这一面还是那一面。只有熟悉了一个地方,就能不断地找出你想拍的东西。”

孙志军透露,近四五年来,自己还一直在专注一个摄影项目的拍摄——佛教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印度走到敦煌来的?走过哪些地方?印度的佛像、洞窟和敦煌的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它们是在哪些地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希望能在一个大格局下审视敦煌。目前,孙志军还差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尚未完成,他期望能够在明年完成这个拍摄计划。●



孙志军
文物摄影师

Q: 很多壁画你都拍摄了很多遍,在拍摄上会有哪些变化?

A: 举个例子,比如,莫高窟71窟的一幅非常残破的壁画,我最初是按常规的拍摄计划来进行的。后来,我读到有研究报告说,这幅画其实非常了不得,它在八平米的大小里集中了四种不同的绘画风格,有中原风格的,有西域风格的,还有龟兹风格的等等。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再去看这幅画,感觉就会不同了。所以,这种拍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思维上的变化,一种专业知识的积累,并不是画本身的物理变化。

Q: 你对莫高窟的壁画都烂熟于心,其中有没有自己偏爱的画?

A: 说实话,并没有特别偏爱的。因为我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每一个拍摄的对象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只是力图将先人留下的美通过我的相机展现出来,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充分地展现给大众。

Q: 洞窟内的拍摄有很多限制,哪些情况的拍摄难度特别高?

A: 难度高的实在太多了。因为整个洞窟里都画满了画,拍摄的时候常常会受空间所困,比如有些是非常狭窄的通道或是一些拐角处,但你还要尽可能不变形地拍摄下来,都是很高难度的。而且就算你解决了这一次的问题,并不代表你就能解决下一个类似的问题,下一个它又是有变化的。每一个都是个例,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Q: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工作后,你们是如何更好地对敦煌文化进行传播和保护的?

A: 我们总是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但普通大众该怎么去认识和理解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壁画进行价值再挖掘,用当下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传播。

现在是网络传播的时代,所以,我们也会结合一些热点来做推广。一方面会反映敦煌壁画,另一方面还会结合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比如之前做过“清明节”的主题,我们会讲解壁画里是如何反映“清明”的意象,再分析哪些是跟“清明节”或者是我们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孝道、孝心等有关的图像元素。我们会把这些内容提取出来。同时,我们还会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里找到古代敦煌当地在清明节或者寒食节时的习俗,告诉大家古代的敦煌人是如何过清明的。

1. 敦煌莫高窟第332窟·佛与菩萨(初唐)
2. 敦煌莫高窟第16窟与藏经洞(晚唐)
3. 敦煌研究院的付磊(前)和王辉在清理莫高窟第96窟大佛眼部的积尘
4. 在敦煌莫高窟第85窟的壁画修复现场,敦煌研究院的唐伟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史蒂文正在修复壁画
5.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工人正在修缮列格斯坦广场的墙面
6. 修补壁画地仗层的泥都是利用敦煌当地的土混合专门的黏结材料配制的